

湖南人的“黄埔”：建国湘军讲武堂

效法黄埔而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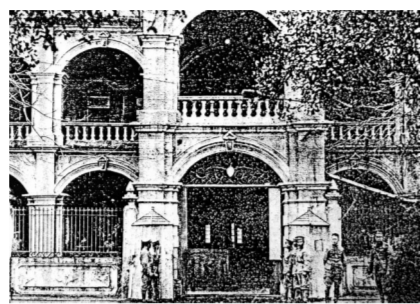
1924年,黄埔军校的成功创办,给了广州国民政府所属各军很大启示,各军纷纷着手开办军官学校,其中以建国湘军讲武堂办得最为成功。

同年9月,谭延闿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以建国湘军为主力出师北伐。11月,建国湘军在江西赣南遭受伏击,腹背受敌,部队损失惨重,不得不从赣州、南康一带,撤退至大庾、南雄等地。“多少苍生泪欲倾,路人犹自说欢迎。伤心掩耳南康道,怕听穷檐爆竹声。”谭延闿为兵败赣南而深感痛心,联想到自己三次督湘三次被驱,深深感到,没有一支过硬的武装,是很难实现政治抱负的。1925年1月,他在广东韶关设立湘军整训处,决意裁汰老弱病残,整顿建国湘军,并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效仿黄埔军校,着手建国湘军讲武堂的筹办工作。2月,建国湘军讲武堂在广州市天字码头原江防司令部所在地(今广州沿江中路233号)开班授课。

建国湘军讲武堂从创办伊始,其办学宗旨和育人之道,即全面仿效黄埔军校。建国湘军讲武堂将“三民主义”奉为圭臬,在第一期同学录序

言中,明确提出“造成革命的基本军人,这是我们创办讲武堂的本旨”“务使兵士彻底的了解主义,所以三民主义,是一以贯之,不可须臾离的”;在第二期同学录序言中,提出“务使兵士彻底的了解主义”“力求士兵与民众的结合”“联合世界上的诸民族共同奋斗”。谭延闿在第三期同学录序言中,不但回顾了建国湘军讲武堂三期办学历程,更明确提出:“始立军官学校,一以黄埔军校为法”“称号虽殊而主义之灌输,精神之衔接,固无时无刻不忘先大元帅之训也”。

当时,建国湘军讲武堂仿照黄埔军校开设了战术、筑城、交通、兵器、卫生、地形、英语、算数等学科,并定期在野外进行战术演习和构筑工事训练。在政治教学上,建国湘军讲武堂专门成立了政治部,主管对学员的政治教育。聘请共产党人方维夏为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讲授“农民运动问题”“剩余价值学说”“中国近代革命史”“三民主义”等课程。毛泽东、李富春、陈延年、恽代英、萧楚女、李六如、方维夏等共产党人,孙中山、廖仲恺、谭延闿、程潜、方鼎英、陈嘉祐、鲁涤平等国民



▲位于广州长堤的建国湘军讲武堂

党要人,都曾到校为学员作过政治演讲,宣传革命思想。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也曾三次到校,为全校师生作政治演讲。

1925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驻粤各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建国湘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建国湘军讲武堂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毛泽东被聘为第二期政治教官,他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先后到校演讲。

汇入黄埔洪流

建国湘军讲武堂从1925年2月开班授课,到1926年8月停办,共办学三期:第一期开班于1925年2月,同年12月毕业;第二期开班于1925年4月,1926年2月毕业;第三期开班于1926年3月,同年8月毕业。

1926年3月,广州国民政府“为打破地方主义,为集中人才起见,不能不统一军事学校”,决议“合并军校暨各军所立学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通称黄埔军校),分军官班、军官预备班、入伍生班,仍

于埔校为校舍”,获得军事委员会通过。至此,建国湘军讲武堂以现役军官为对象招收的第三期学员,随即隶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官补习班。

总览建国湘军讲武堂的办学历程,其存在时间虽短,但由于毛泽东、李富春、恽代英、萧楚女、李六如、方维夏等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对建国湘军这支革命力量的重视,对建国湘军讲武堂的办学给予了组织指导、教学指导、实践教导,建国湘军讲武堂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称盛一时,堪称国共合作的典范。

建国湘军讲武堂办学地虽在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但无论教官队伍还是学员队伍,大都为有着强烈革命抱负的湖南籍革命青年。第一期361名学员中,湖南籍352人,占比97%;第二期440名学员中,湖南籍422人,占比96%;第三期347名学员中,湖南籍330人,占比95%。这些学员大多是从湖南去投考的青年学生或建国湘军中贫苦出身的兵士或连排职军官。事实证明,建国湘军讲武堂毕业学员成才率极高,涌现出了大批将领级军官。

北伐军兴后,已并入黄埔,改称军官补习班的第三期学员甫一毕业,即投入火热的战场。

(摘自《文史博览》2024年第8期 谢四平/文)

鲜为人知的“人民奥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少国家开始出现工人建立的体育组织,诸如“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工人徒步协会”等。1920年,德国、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国无产阶级体育组织的代表会聚瑞士卢塞恩,创办了“国际体育文化协会”。该协会组织了史无前例的“工人奥运会”:与传统奥运会不同,工人奥运会颁奖环节不是升国旗,而是升起象征共产主义的红色旗帜。第一届工人奥运会吸引了来自12个国家的15万人参与,而1931年的第二届工人奥运会则有25万名观众;女性被鼓励参与竞赛,在第一届工人奥运会中,女子100米接力的世界纪录被打破。

1936年,柏林奥运会即将举行。同年2月,加泰罗尼亚左翼阵线赢得选举,巴塞罗那随即成为反法西斯奥运会的举办地,组织者宣称,这将是“一次民治和民享的‘人民奥运’”。那届奥运会有望吸引来自17个国家的2万人参与,其中包括来自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流亡者。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1937年7月18日,当运动员到达巴塞罗那,准备参加第二天的比赛时,一场军事政变使西班牙变了天。赛事被迫取消,运动员大多踏上返程之路,但有包括运动员在内的两百多人选择留下,并加入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摘自《老年文汇报》郝晓菲/文)

AI为何还没让我们赚到钱

很多人都观察到了,AI(人工智能)已经被用于很多领域,相关公司的市值都在飙升,人人都在谈论它。可是反映在经济上,AI对生产力的促进还没体现出来。为什么AI还没有让我们赚到钱?其实这是通用技术正常的发展阶段。

AI赚钱慢慢来

1879年,爱迪生用点灯亮了第一盏电灯,可是过了20年,美国才有3%的家庭用上了电。到1890年,只有5%的美国工厂用上了电力。甚至到1910年,新建的工厂还是优先采用蒸汽动力。这是为什么呢?

3位经济学家——阿杰伊·阿格拉沃尔、乔舒亚·甘斯和阿维·戈德法布刚好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在《权力与预测》一书中提出,我们此刻正处在AI发展的“中间时代”,通用技术要真正发挥生产力效能,需要经过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点解决方案”,是简单的输入端替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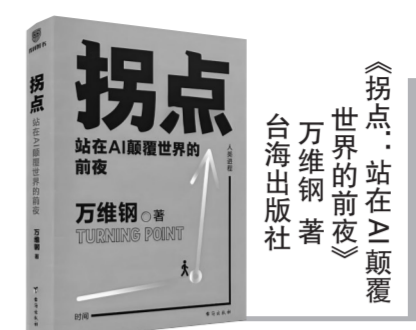
比如,用灯泡比用蜡烛方便一点,用电力做动力有时候会比用蒸汽动力便宜一点,你可能会有替换的意愿。但是仅此而已。

第二个阶段叫“应用解决方案”,是把生产装置也更换了。

以前的工厂用蒸汽做动力时,都是一根蒸汽轴连接所有机器,蒸汽一开,所有机器都开动。人们发现改用电力之后,每台机器都有独立的电源,完全可以用哪台开哪台,岂不是更省钱?但这并不容易,这意味着你必须对机器进行改造,根据独立电源重新设计。这需要时间。

第三个阶段叫“系统解决方案”,是整个生产方式的改变。

蒸汽时代的厂房,因为要用到蒸汽轴,所有机器都必须布置在中央轴附近。用上电力后,你可以随处安装插头,将机器放在工厂里的任何一个位置,那么你就可以充分利用空间,没必要把所有机器集



中在一起。这就使得“生产流水线”成为可能。

AI也是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AI的应用还处在点解决方案和一定程度上的应用解决方案阶段,尚未达到系统解决方案阶段。这就是AI还没有发挥最大作用的原因。

从商业角度看AI如何赚钱

从商业角度看,AI是一个“预测机器”。预测是决定的前提,AI预测能改变人们做决定的方式。

举一个预测取代规则体现在经济上的例子。农民种田最早都是根据天气预报,自己大概估计一下什么时候播种、施肥、收割。决定是自己做的,预测只是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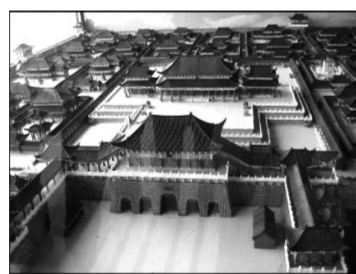
后来天气预报越来越准,美国的气象公司提供了一项人性化服务,专门对农民提供精确的预测,比如告诉农民今年播种只有8天的窗口期。气象公司一方面根据天气预报,一方面根据作物类型,直接告知农民最佳的播种、施肥和收割时间。

AI还可以改变农业生产的方式。

现在很多农产品都是在温室里种植的。温室种植好处很多,但也存在问题——容易遭遇虫害。那么就有公司利用AI,提前一周准确预测某个温室会不会长虫。有了这一周时间,农民就可以提前订购抗虫用品。但到这里还只能算是一个应用解决方案。

系统解决方案是,既然AI预测能力这么强,农民就不用担心虫害了,可以种植一些原本因为担心虫害而不敢种的农作物。还可以扩大温室的规模,因为不用担心虫害袭击一大片农作物。农业的生产方式被改变了。

宋朝为何没有一座像样的宫殿



皇城周围也布满了住宅和商户,要扩建就要先拆迁,如果因为扩建弄出群体事件,问题就大了。于是太宗皇帝说:“内城偏隘,诚宜开展,迁动居人,朕又不忍。”扩建的念头就此打住。

靖康之难后,金人的铁蹄踏进了汴梁城,赵宋官家南下定都临安(今杭州)。随后,南宋朝廷开始

在凤凰山下兴建皇城,一座官城面对钱塘江拔地而起。后有山,前有河,算得上风水宝地。但一山一河也限制了皇城的面积,夹在山河中间的南宋皇城规模不及北宋,南宋皇帝连拆迁扩建的机会都没有了。(据“历史品读”微信公众号 刘不成/文)

唐有大明宫,明清有紫禁城,而向来以繁华富庶著称的两宋却没留下一座像样的皇家建筑群。今河南省开封市即为北宋都城汴梁。考古发现,北宋皇城南北长1090米,东西宽1050米,周长4280米,合宋制七里左右。这个规模看似不小,但需要说明的是,北宋时期有皇城无宫城,皇帝起居工作的禁中内,同皇城之间也没有实际的物理区隔,跟明清紫禁城没有可比性。

北宋皇城的寒酸是全方位的,北宋皇城不但跟历朝历代的皇城比不了,就在当时汴梁城内也不算气派。当时的汴梁城内有一处叫“丰乐楼”的大酒楼,站在楼上,能够一边喝酒一边俯瞰皇宫大内。

实际上,自从赵宋官家黄袍加身之后,扩建皇城、重修皇宫的念头就没有停止过。但当时的汴梁城已成为一个市民经济极度繁荣的大都市,

很好,会增值

我妈对我的第一项投资,是让我学画画。

七八岁之前我挺会画画,还得了奖,在小县城里出名了一阵。我妈就决定好好培养我,让我学画画。

可她也知道从哪里抓起,无非是让我多去文化馆,拜访老师。与老师是很熟了,可我不会学习,画的画一点儿没长进。随着学业越来越忙,我也不努力,就越画越差。

我妈虽然投资失败,却做了一件事,就是从阻拦我到处乱涂乱画。

从三岁到七八岁,我的童年在粉笔画中度过,不但在自家的地上乱画,还揣着粉笔画到我妈的单位画,画在墙上、仓库的大铁门上。感谢我妈,她让我有了全世界都是一块大黑板的快乐童年。

第二项投资,是帮我集邮。

九岁开始,我忽然喜欢上了集邮。我集邮用的是最笨的办法,从别人的信封上撕邮票。不小心撕破了,就拿镊子修。

没想到我妈居然又很支持我,打算投资。她说这

是好东西,以后会涨价。

这简直是莫大的鼓励。在她的鼓动下,亲戚朋友收到信时,往往会第一时间把信封给我。偶尔内蒙古老家来信,我妈会先把信封给我,让我撕邮票。每撕一枚邮票我就特别开心,要欣赏很久,觉得会增值。

当然,我妈的这项投资最终又一无所获。但她无意中让我产生“迷之自信”:自己喜欢的事,哪怕看起来不靠谱的事,也有重大意义——会增值。

第三项投资,是支持我当记者。

读中学时,我一直误以为自己喜欢干新闻工作。我妈非常支持我,理由听上去很荒唐,说干新闻好,像《正大综艺》里的记者一样,全世界到处玩,还不用自己花钱。

后来我倒确实干了八九年的新闻,但也无疾而终。我妈愿意投资我的新闻梦想,让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

最后一项投资,就是读

书考试了。这一项投资上,她付出得最多,耗费的心血也最多。但我两次高考都失败了。

让我最难过的是,我没有看见过一次我妈为此难过的样子。在第二次高考前不久,我半夜起来,无意中听见她在自己房间里向她早已去世的奶奶祈祷,保佑我如愿考上大学。这样大的期盼,落空后怎么会不难过呢?但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来。

我妈对我的所有投资,还有各种跟投、追投,都失败了。但到四十岁,我自己也做了父亲,回首年少时光,内心突然有种强烈的庆幸和感激。对一个孩子提出的各种人生项目盲目看好,让他在只有几盒白粉笔的童年里觉得世界毫不单调,因为画板足够大——这才是真正的“投资”。我妈让我觉得,只要是认真去做的事,就是值得的,只要我想去挑战,就能成功。世上任何鼓励,都敌不过一个“投资人”的五个字:很好,会增值。

(摘自《读者》六神磊磊/文)

两位大艺术家怎么会和空气污染扯上关系?

通过收集19世纪空气中二氧化硫排放物的含量,并将其在时间维度上与透纳和莫奈的画作风格进行对比,研究者们惊讶地发现,两位画家的画风变化和空气污染排放物的含量具有相似的趋势:随着污染物含量的增加,相应时期画作中的景色渐渐从清晰变得朦胧,色彩从对比鲜明变得泛白,风格也从具象绘画转向了印象派。

当时的背景是,19世纪,伴随着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西欧城市中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从光学的角度出发,空气中大量污染物的存在会导致人们所能见到的景色对比度降低(物体边缘变得模糊),色调也更白,这恰恰和透纳与莫奈的画作风格转变有一致性。

于是,科学和艺术在此交汇。研究者们认为,这一结果表明,在人们发明专业的空气污染治理仪器之前,艺术家的画作为大气污染的趋势留下了证据,而大气等环境特征的变化,则在改变我们创造艺术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摘自《少年新知》阿铭/文)

莫奈、透纳与空气污染